

中国近现代同人报刊的先声:早期留日学生的办报实践*

易蓉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办报实践作为中国近现代同人报刊的先声,由于身处异国的特殊的办报环境以及留日学生这样特殊的群体,呈现出不同于当时商业报刊和党派报刊独特的风貌:独立意识的萌芽,“新”国民的办报宗旨,地方化的办报视野以及刊物“同人性”所带来的独有开放性、批判性、独立性。并以此为开端,同人刊物成为具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参与“内界之竞争”的最便捷也是最重要的方式。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同人刊物;早期留日学生;办报实践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1-0150-04

在中国近现代公共空间的建构中,知识分子刊物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胡适在1923年给友人的信中就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400}知识分子借由着自己创立的公共空间影响了社会的进程,改变了时代。特别是“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了商业报刊、机关报刊、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2]11}。现代同人刊物在逐步取代社团会刊后曾一度成为出版界的主流,它的公共影响使得其成为了近现代期刊史上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现象。这样的一种局面可以说是中国公共空间所特有的现象,它独有的文化价值、政治功能等公共性是商业报刊、党派报刊不可比拟的,对于形构中国式的公共空间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早期留日学生报刊作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同人报刊的先声,更是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近代留日学生,作为最早走向海外一批知识分子,虽身在异国,可心在魏阙。已是有着独立意识萌芽的他们初期的“新国民”的办报实践带有启蒙的意味。特别是戊戌政变后,日本已成为流亡者和革命者集散地,他们的报刊所带来的要冲破旧网

罗、打破旧世界的新气象,给留日学生以极大的冲击。其实藤惠秀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提到,亡命客(革命的失败者)流亡到日本,在某一意义上,也可视为留日学生。这些亡命客中包括当时的革命骨干:孙中山先生、康有为、梁启超、黄兴、章炳麟等。留日学生与革命家的思想的互动与结盟,使得他们的办报实践后期趋向革命化,成为撼动中国封建政治格局的有力武器。但由于留日学生的办报是以同乡会为根基,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这种狭隘的划疆划块的地方化使得他们启蒙影响局限于狭小的地域,现代传媒明显带有传统中国“乡土本色”的封闭性,局限了其公共影响力。但同时,由于共同只求“输入文明增益民智”理想和不求营利的办报宗旨,早期留日学生报刊奠定了我们近现代知识分子同人报刊的独有的“独立”姿态。

一、独立知识群体的兴起与“国民启蒙”

留学潮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主动寻求现代化的开始。特别是留日潮,从19世纪末开始已成为一种主流化的新选择,当时的“学子相互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3]37}20世纪初的留日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并很快于1905—1906年达

* 收稿日期:2013-05-26

作者简介:易蓉(1969-),女,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副教授。

基金项目:2013年湖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公共性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同人报刊研究”(编号:13C929)阶段性成果。

到最高峰,有8千人左右。^①在弹丸之地日本聚集如此多的中国学子,这无疑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已和以前第一批幼童留美、公派留欧的群体不一样,他们心智更为成熟,较少官方意识的侵扰。梁启超在1902—1903年旅日期间,就敏锐地感觉到当时大多数中国留日学生和维新时期的“士人”有很大的不同,他称这些留学生为“无科第、无官阶”的“少年新进”,有时更称为“年少躁进之士”。李伯元在科举初废、留日热潮达到高峰期连载的小说《文明小史》中描述几个留学生在赴日船中的心态和认识,颇有代表意味。他们干了上海带来的白兰地酒,快意地说“我们从今脱了羁束。”“我只可怜好些同学,在我国学堂里面,受那总办教习的气也够了,做起文课来,一句公理话也不敢说。什么叫做官办学堂?须要知道,触犯了忌讳,小则没分数,大则开除,这是言论不得自由。学习西文、算学,更是为难,一天顶一天,总要不脱空才好,譬如告了一天假,就赶不上别人,不足五十分,又要开除,这是学业不得自由。还有学生或是要演说,或是要结个会,又有人来禁阻他,这是一切举动不得自由。种种不得自由之处,一时也说不尽,亏他们能忍耐得住。”“结会等事,乃是合群的基础;……为什么我们中国这般怕人家结会演说”“这是专制国的不二法门。”^{[4]226}这批“少年新进”渴望自由的心态已隐然有要独立的人格意识,而“合群”“专制国”的观念,乃有公共的意识启蒙。

这批到了异族他乡的与本国旧世界有对抗感的群体,被外人轻视的疏离感特别容易感受“国”的概念,特别是一些屈辱性的对待^②,民族观念、爱国之心可以说是总体性的爆发。1903年的东京留学生拒俄学生军就是这个爆发集中体现。当俄国拒绝从东北退兵的消息传到东京,500余名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集会,声讨沙俄侵华罪行。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当消息随着电文传到由上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上海团体再一次为拒俄召开的张园集会上时,与会者群情激动,向东鞠躬,表达敬意,“论者谓此为上海新中国少年庆祝留学日本新中国少年爱国心之第一次。”并且当场提议编练义勇队予以响应。外人经营的《字林西报》上就说“中国立

国以来两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不久,在上海有蔡元培等人组成“对俄同志会”,并创《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而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也召开拒俄大会。《新民丛报》评价:“学生驱于义愤,动于热诚,奋然以一死报国,是诚足振我国人柔弱之积习,雪中国人无爱国心之耻辱矣。……国所以立者民气耳,使我国人而尽如日本之学生,则俄虽强悍,曾何谓焉。”^{[5]259-272}留日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知识群体的力量已显现出来。

所以罗志田先生在其文章《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中认为大约1903年起,近代知识分子自觉意识已萌芽,这样的论断不无道理。^{[6]142}那年一月《湖北学生界》杂志的创刊,就颇具象征意义。

《湖北学生界》是湖北留日学生的同乡刊物,它在创刊号《叙论》中明确将学生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独立群体,与国家的发展直接联系“同人是为学报也,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于不胜之势。且吾侪学生也,输入文明与有责焉。与其学成归国,濡滞时日而后转述于国人,何如旋得旋输,使游学者不游学者,日征月迈,同为平等之进步。”^{[7]5}从该杂志的内容来看,里面的“学生”显然已不是清代科举中人的代名词,而是一个开始有着独立意志并能自立的社会群体。特别是该刊第二期发表的李书城写的《学生之竞争》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读书人要主动脱离出“士”这一传统读书人群体的自觉意识。李书城将学生列为一个单独的社群,居于由士大夫组成的上等社会和基本不识字的下等社会之间,并明确指出上等社会已“崩溃决裂”而不能救国,只能“俱待继起者收拾之”;而下等社会则因“识字者寡”,不知国家历史地理而使爱国之心无由产生。那么学生之位置重矣,“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而对一国之主人的“下等社会”,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李书城不仅强调学生之位置重要,而且提出学生除了留学进行“外界之竞争”,而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内界之竞争”:一是“权利之竞争”,即争参政议政之权利;二是“势力之竞争”,即争国是上的影响力。^{[8]1-5}从这

^① 留日学生最高数各方估计最多的两万,最少的也有6千人。实藤惠秀认为8千人是较确切的数字。关于留日学生人数的趋势变化参考本书的附录三。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25页。

^② 如日本车夫与中国留学生的对话,以及日本小孩“猪尾巴”之类的嘲弄。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8-120页。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09-113页。

些言论我们已经看出,学生所荷载的新知识使他们已意识到自己和整个传统社会的疏离,而“权利之争”的想法又完全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道治一统”的传统精神的影响,处处呈现出一种过渡与萌芽的特征。

而对于留日学生来说参与内界之竞争的最便捷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现代公共媒介的公开运用——创办发行留日学生刊物,办刊出发点基本上是国民启蒙,是为造就一个全新的国民:

“本报为吾国国民说法,一篇一章一行一句,无不补国人公德之缺点,启世界民族之思想,科学益其智识,理论辟其精神,事实助其感情,文词助其美德,实足养成中国将来之国民。”^①

“本编以扩充本国见闻增益国民智识为主。”^②

留日学生报刊对自己传播对象有了明确的预设,就是“本编为一般国民说法”^③,这和维新派报刊局限于士人阶层已有明显不同。而且它明确地表明是要“立言务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于一人一事之是非不暇详述”^④,知识分子首次将普通民众全体利益放在自己的思考的中心。而造就新国民必须要有新思想新学术来启发民智,他们基本以介绍学术为要务,出现了大量西洋政治经济学说的译介,这与留学生有语言和地利之便分不开,这也成为后来知识分子报刊的一大传统,如顾燮光在1904年写的《译书经眼录》中说“留东学界,颇有译书,然多附载于杂志之中,如《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各类,考其性质,皆藉译书别具会心,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留学生杂志表现出的这种明显的政治意图,王国维后来从学术的角度加以批评“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事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9]95}即便这样,它仍不失为时代风潮的引领者。《东方杂志》1905年引述《南方报》的评论“至辛丑壬寅而后,游学生之出报者多,前此秉笔之伦,亦多更习于事,于是议论渐归纯实,学术多所发明,而社会亦欢迎之不暇。足征报馆之进步,与社会之进步为缘。”^{[10]208}留日学生刊

物的创办者和维新派不同,他们把普通国民作为自己的读者对象,他们要“新”国民是为了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不是为“新”旧皇统而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所以随着后期革命派的不断介入,革命的气息、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⑤

我们知道,大众媒体、新思想与新文体的配合产生的轰动影响,是晚清知识分子公共实践的最早成功尝试,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公共实践不仅是内容的公共性的问题,传播形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表达让公众看得懂产生影响的问题,意即文体的问题。《时务报》使梁启超名重一时,产生广泛影响,部分即在于其“语言笔札之妙”,和以前的古文有着极大的区别“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1]70}因称“时务文体”。而章炳麟是清代学术的压阵大将,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就称“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而且是个极端的复古论者^{[12]261}。他在《时务报》做了一段时间的主笔,写的时论《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1897年3月3日)便引来批评,叶翰说它“太艰涩,说太散碎”^{[13]2589},钱恂更直接表示章不适合做报馆之文“贵报中章君,请其少动笔为妙,伊太古幻,非报之本意也。”^{[14]2999}这说明章炳麟的报刊文章虽有高深学问,但文体已不适宜时代和新的传播媒介。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通上下之情,因而主张以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浅近文宗”作为传播现代思潮的利器。这些都是在新媒体的带动之下,知识分子认识和实践的变化,不管其是有意还是无意。自此以后,文体的时代性与大众化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实践其公共性的关键。

留日学生报刊的创办者已有明确的文体观念,他们虽没有像胡适那样明确提出“白话文”的文体革命,但他们已经非常有意识和自觉地注重“新”国民的表达方式,“虽不专工于文辞,然务适于我国民之用,说理必明畅,记事必简赅。”“文辞不事艰深,

① ——《湖北学生界简章》,见《湖北学生界》,1903年2月第2期。

② ——《游学译编简章》,见《游学译编》,第二册,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③ (《本编特色》,见《直说》)。

④ (《浙江潮发刊词》)。

⑤ “时孙文、黄兴等常亲赴东京,聚学生数千人,演说三民主义,学生受其影响。以海外言论之自由,皆明目张胆,痛谈革命。《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乃其最著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67页。

且立论皆以实用为主,非徒尚空谈者可比。”^[14]《湖北学生界》则详尽阐释自己要“不责精深”:“其第二义曰不责精深。……夫文字者,在以吾之思想传于人之脑筋,在以吾之精神达于人之灵魂。若以奇古渊深,自矜而不为阅者计,精神思想不能普及于国人,吾知其为一己之名誉,计非为国人谋公共之幸福也。”^{[7]5}作者对当时名士写作时故作高深的一大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吾见今之专门名家亦蹈斯蔽,耻为浅近易解之书,而述其高深不可企及之学,甚至以浅近易解之理而亦纤纤其词,故作瘦语,使阅者如对大海而叹汪洋,如入五都之市,光怪陆离,不可思议。”^{[7]5}

二、本省化的地域局限和“同人报”的先声

和在日本的维新派、革命派一样,留日学生也是运用新式传播媒介来进行公共实践。但和他们又不一样,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的,脱离国内一切社会关系的他们就像飘浮的浮萍,在异国他乡以中国强大的地缘关系传统,以同乡的结构凝聚团体,“外人之诋中国也,曰中国人无公共心,如滩头乱石,一盘散沙。……呜呼!我炎黄之子孙其以不能合群之故而为次最惨最酷之天行所淘汰矣乎。同人游学海外,目击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争竞存之恶风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以为国民之向导焉。”^[15]大量在同乡会基础上创办的同乡会报刊出现,比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云南》、《四川》、《河南》、《晋城》等,这是明确用本省的名字命名的,还有一些不是用本省的名字,但同样是同乡刊物,非常典型的就是《游学译编》,“本社同人大都湘籍,眷怀宗国之外,而于桑梓尤注意焉。”^[16]这些留学生杂志都以本省为中国未来之希望而自命。

此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认同取向,固然是出于对清王朝的彻底失望,而试图以“省”的地缘政治的亲合力来重塑强大的中国,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留学生寻求自我认同的需要。但这种传统的认同方式中却隐含着狭隘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局限和危害,对这点其实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已有相当的认识。1903年的同乡会刊物《新潮》第三册上就刊登了《非省界》一文,对国人传统地域意识所带来的“戈矛森立”的狭隘团体划界进行梳理和批评:“省界胎于庚辛之间。广人《新广东》出世,商界问题如花初萌,于时各省同乡恳亲会后先成立,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来东土者,浸淫渲染,已成习惯。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何处人。虽以平日之旧交,儿童之昵友,必有一画然不可合并之势。与乎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至入其社会,审其内容,则阴霾沉沉,戈矛森立。”而这最大的危害在于,“自省界之说起,而国界种界反退处于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之间。”^[17]这不仅是对意识的影响,这种狭隘地域观念直接影响到中国现实革命,1907年《汉帜》就呼吁各省“破除省界”急速援助湘赣革命军,因为“省界”意识使得人们“若犹徘徊歧路,各不相援,则我国内容之砂散,正西人之笑我‘十八省如十八军,四百兆人为四百兆心’者也。各省之局外袖观,不独无以对国民,抑亦无以对各国矣。”

这种局限体现在留学生杂志当中,就表现为杂志内容“本省化”、“地域化”倾向。刊物的编辑、撰稿人都是该省人士,有着深厚的同乡情谊,选稿用稿时对本省稿件更为重视。^①各个同乡会的留学生杂志都基本以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内容的重点,其他省的情况就在其视野之外。《浙江潮》在自己发刊词中声明“欲争自由,先言自治,然必于其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详悉无遗,而后下手之际乃游刃而有余,先以浙江一隅为言,此非有所畛域限于所知也。”在它的新浙江与旧浙江专栏和调查会稿专栏共发布34篇调查报告,报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内容没有超出浙江省。^②而这内容相对具有的封闭性,刊物非常明显的地域性,多少影响其传播和影响的公共面。

我们知道,晚清到民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新知识

① 如《湖北学生界》总编:刘成禺,主要编撰人员:张继煦、但焘、刘成禺、屈德泽、范鸿泰、权量、蓝天蔚、李步青、陈文哲、张孝移、金华祝、程明超等,其中范鸿泰、权量、陈文哲非湖北籍。《江苏》总编辑:秦毓鎰,其他编撰人员:张肇桐、汪荣宝、柳亚子、陈去病、黄宗仰、金松岑、刘师培、胡彬夏、曾志齐等,其中曾志齐是上海籍。

② 《杭城报纸销数表》、《杭州金融机关组织表》、《杭州放足会第二次调查信》、《绍兴新昌县物产表》、《日本神户大阪两埠居留之浙商人数事业》、《浙江运河输船通行表》、《温州乐清县教育局》、《处州青田县调查稿》(官场之种种活剧、青田之风俗等)、《湖州物产生利记》、《嘉兴海盐县之慈善事业》、《海盐县徵米徵银之实数》、《台州黄岩县城内学界区所表》、《处州宣平县之种种调查》、《浙江省会学校一览表》、《绍兴全府当业架本调查表》、《绍兴府城内书铺一览表》、《宁波奉化县学校一览》、《浙省销场税之一斑》、《嘉兴平湖县物产表》、《浙江全省壬寅年房捐酒捐膏捐总数》、《浙江省防调查表》等。罗家伦主编,《浙江潮——中华民国史料丛编》[J],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

分子(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个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科举制的废除,读书人从科举到仕途的安身立命之途完全失去,他从社会的中心突然边缘化(余英时),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皈依的群体。他要如何从边缘走到中心,和社会、国家、民众发生联系,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身份认同的大问题。而就这些新知识分子本身来说,尽管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居于“边缘”,但却是社会中的知识精英,是社会掌握知识最多的阶层。他们有着双重的知识体系:传统的儒教熏陶,“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他们内在基因;西学的后期教育,独立自由理念,不愿受任何外力羁绊而自立于社会成为他们为人最大追求。这两大思想的交融,使得这批知识分子两大理想内在发生冲突、碰撞。如何使得它们并行不悖,成为新知识分子的人生最大抉择。

既不失去独立自由的人格和学术追求,又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参与社会的公共领域,不受政治的羁绊而完成自己的政治实践,近代报刊成为他们实现自己理想最好的平台。同人报刊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催生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同人报刊可说是我国近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同人报刊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历史上一个独有的传播现象它以专有名词和概念进入了当代的各大有关新闻的词典中^①。

早期留日学生作为自觉意识已萌芽的近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刊物其实已经有了同人杂志的萌芽。《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是这样概括同人报刊的“同人报(fraternity newspaper)由编辑部成员合作经营并共同主持编辑业务的报刊。主办者自愿结合,以他们的共同主张为所办报刊的宗旨。同人报的主办者常以“同人”(“同仁”)自称。报刊的出版(发行)人和编辑人均由其成员担任。对报刊的活动方向和重大材料的刊登,须经过全体成员或主要成员讨论决定。但同人报的同人只是一个松散的结合体,当同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任何成员都可

以宣告退出。”^{[18]317}我们以《湖北学生界》为例,它的《开办章程》中所列举的各条其实和后来以《甲寅》创刊为标志而后兴盛发展的同人报刊的形式和精神是如出一辙。

《湖北学生界》有着共同的主张,“第一条宗旨: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报刊主办者是自愿结合的群体,“第二条定名:本报由湖北留学日本同人创办故名湖北学生界”;报刊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是由其成员担任,“第三条体例:一、本报创办之初暂就同人肄业所及择门分任撰译兼行其目如左”报刊经费是由成员们自己出资或民间集资,保持报刊独立于党派和商业资本的自主性,“第四条经费:本报现由湖北游学同人集资百份,先行开办。以日币十元为一股,作为基本金并每月酌出维持费,每年年终算一次,由会计报告同人,按股分任,每股常年送本报一份,不收报资。内地同志愿充本社社员者须认定本社章程始行寄与证书。内地官绅如有热心赞成捐助款项者,即行登载本报,推为本社名誉赞成员并酌送本报,既本报附刊各书籍以酬高谊。第五条职员:本社撰译庶务职员均由社员更迭选任概不给资,按年送本报一份以作酬劳。”同时期的《游学译编》宣称“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本无意推广销路希图利益”,“是编之杂志在扩充内地见闻,同人任事概不取资”。这些都是留日学生刊物的普遍情况。这些刊物是同人间出于共同主张无偿集资合作创办的刊物,同人根据能力担任编撰者,编撰者之间是平等合作关系,不以赢利为目的,基本没有稿费和编辑费。此时留学生刊物经费基本来源于本社同人集资或是完全是以同乡的情意本省官绅父老的捐资。^②

从上面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说,留日学生杂志已是同人刊物的雏形,已形塑出知识分子“同人性”所特有的脱离于资本控制和党派政治控制的“独立”姿态。此后,已有了自觉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此为开端,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并把它作为争取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争取权力的一种斗争手段,使它成为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独有的公共空间。

^① “同人杂志”、“同人报”可见于以下词典《简明出版百科辞典》〔日〕《出版事典》编辑委员会编纂,布川、角左卫门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编辑出版辞典》陈友政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11月北京第1版《新闻学词典》,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编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② 《游学译编》第四期登载了湖南编译社名誉赞成员衔名及捐款:袁海观察英洋贰佰圆,杨慎初观察英洋壹佰圆,秦子和观察英洋拾圆,刘吉庆大令英洋贰拾圆,章味青大令英洋拾圆,湖南善后局英洋壹佰圆,湖南矿物总局英洋壹佰圆。仍部分有《时务报》捐资办报方式的影响,但已不构成力量操纵报纸。

参考文献:

- [1]胡适. 与一涵等四位的信 [M]//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第3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陈平原.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 [A]//程光炜主编. 大众媒介与现当代文学.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3.
- [4]李伯元. 文明小史[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 [5]黄福庆. 清末留日学生[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3.
- [6]罗志田.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A]//许纪霖编.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 [7]叙论[J]. 湖北学生界, 1903(1).
- [8]李书城. 学生之竞争[J]. 湖北学生界, 1903(2).
- [9]王国维. 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 [M]//王国维遗书. 第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 [10]说报[J]. 东方杂志, 1905(2).
- [11]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朱维铮校注.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 [12]胡适. 胡适全集(卷2)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 [13]上海图书馆编.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4]本志之特色[J]. 浙江潮, 1903(2). 本编特色[J]. 直说, 1903(1).
- [15]湖北同乡会缘起[J]. 湖北学生界, 1903(1).
- [16]本社同人启[J]. 游学译编, 1902(2).
- [17]文诡. 非省界[J]. 浙江潮, 1903(3).
- [1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 [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立 早

The Forerunner of Modern Coterie Magazine in Chinese—— On the Practice in Running Newspaper of Early Chinese Studying in Japan

YI R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s modern newspaper practice as the Chinese newspapers' harbinger of modern colleagues due to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in a foreign newspaper as well as students studying in this special group, which show a unique style and features different from business newspapers or partisan newspapers' style and features, budding sense of independence, "new" operational purpose national local and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s vision "with humanity" has brought a unique openness, criticism independence. As a beginning, colleagues publications into a consciousness of intellectual participation "competition within the sector" which becomes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most important way.

Keywords: Chinese modern coterie magazine; early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practice in running newspapers